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主办
莽景石 主编

南开日本研究

NANKAI JAPAN STUDIES

2012

杨栋梁

日本近代蔑视型中国观的形成

胡 澎

非营利组织在日本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台湾]黄文宏

西田几多郎论“逻辑的理解与数理的理解”

[台湾]廖钦彬

近代日本的宗教哲学——真宗大谷派的清泽满之与京都学派的田边元

李 卓

女性社会角色的变迁与日本的现代化

[日]米原谦

日本民族主义中的“美国身影”

[日]桂岛宣弘

“跨越国境的历史”与东亚——从日韩思想史的视域思考



世界出版

封面题字：范曾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主办

莽景石 主编

南开日本研究 2012

杨栋梁：日本近代蔑视型中国观的形成

胡 澎：非营利组织在日本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黄文宏：西田几多郎论“逻辑的理解与数理的理解”

廖钦彬：近代日本的宗教哲学

——真宗大谷派的清泽满之与京都学派的
田边元

李 卓：女性社会角色的变迁与日本的现代化

臧佩红：试论战后日本的女子教育

周萍萍：日本女子学校之发展考究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南开日本研究2012 / 莽景石主编.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5012-4449-2

I. ①南… II. ①莽… III. ①日本—研究 IV. ①K313.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70126号

责任编辑 罗养毅
责任出版 刘 喆
责任校对 张 琨
封面设计 嘉 维

书 名 南开日本研究2012

Nankai Riben Yanjiu 2012

主 编 莽景石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世知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京晟纪元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 787 × 1092毫米 1/16 21¼印张

字 数 333千字

版次印次 2013年4月第一版 2013年4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4449-2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刊的出版承蒙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资助

编辑委员会

主编

莽景石

编辑委员（按拼音排序）

陈健安（复旦大学）

高 洪（中国社会科学院）

关 权（中国人民大学）

刘江永（清华大学）

李 晓（吉林大学）

李玉潭（吉林大学）

李 卓（南开大学）

莽景石（南开大学）

孙 歌（中国社会科学院）

王新生（北京大学）

杨栋梁（南开大学）

周颂伦（东北师范大学）

发刊词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发轫，从一个特定的学术研究领域的视角观察，它还意味着当代中国的真正学术意义上的日本学研究悄然启动，并且在随后的30多年里获得了长足进步，而记录了这一进步历程的最重要的载体形式，则是全国多种日本学研究专业杂志。由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主办的《日本研究论集》就是其中之一，它创刊于1996年，迄今已出版13期，从本期开始，它改版为《南开日本研究》，奉献给读者。

本刊的办刊宗旨是：以中国的历史发展和当代转型为理论思考的背景，提倡科学方法和人文精神并重，鼓励方法论创新和跨学科研究，俾使中国的日本学研究不致流于空泛而富有参考价值。本刊将开设专题研究、比较视窗、海外专稿、学术人物等多种固定和非固定栏目，以期在日本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以及中日关系等广泛的研究领域内，为中国的日本学研究者提供一个公共学术平台。

值此改版之际，我们欣慰地看到，一批具有学术资格、学术责任和学术声誉的日本学研究领域里的知名学者出任本刊编委，他们的支持将会深刻地影响本刊的学术取向、学术风格和学术水平；同时我们相信，在日本学研究领域里辛勤耕耘的全国学界同仁今后惠赐本刊的作品，将会在塑造本刊的个性、语境和精神的同时，权威地反映出中国日本学研究的进步。

目 录

日本历史研究

- 日本近代蔑视型中国观的形成 /1 杨栋梁

日本社会研究

- 非营利组织在日本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42 胡 澎

日本哲学研究

- 西田几多郎论“逻辑的理解与数理的理解” /81 黄文宏

- 近代日本的宗教哲学
——真宗大谷派的清泽满之与京都学派的田边元 /107 廖钦彬

日本女性研究

- 女性社会角色的变迁与日本的现代化 /121 李 卓

- 试论战后日本的女子教育 /141 臧佩红

- 日本女子学校之发展考究 /156 周萍萍

海外专稿

- 日本民族主义中的“美国身影” /166 米原谦

- “跨越国境的历史”与东亚
——从日韩思想史的视域思考 /189 桂岛宣弘

论文

- 政府温和干预、金融约束与市场体系重建
——战后日本的金融发展与金融深化 /205 郑 蔚

交易成本与公司治理

——以日本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改革为中心 /220

平力群

作为“历史的现实”的田边哲学 /241

吴光辉

日本研究学术史

中国日本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一种学术史的回顾与展望 /260

刘岳兵

日本学人物志

邹有恒先生学问人生评传 /310

周颂伦

稿 约 /328

日本历史研究

日本近代蔑视型中国观的形成^①

杨栋梁（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内容提要 鸦片战争是日本的传统中国观发生根本性逆转的直接契机，这一转变源于对中国现况的认知，进而在相当一个时期里又表现为不尽一致、错综复杂的对华情感、态度、立场和政策主张。但是，以甲午战争为界，在与世界、中国的共时性比较和历时性“互动”中，日本最终消除了对中国的敬畏，形成了国民性的对华优越感和蔑视型中国观，进而支配了其近代的对华行动选择。

关键词 日本近代 中国观 亚洲主义 甲午战争

^①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近代以来日本对华认识及其行动选择研究”（项目批准号：06JZD0023）的阶段成果，文中许多资料是由课题组成员刘岳兵教授和王美平博士搜集整理的，在此特致谢意。

在日本晚期封建社会的德川中后期，传统的慕华意识受到来自儒学内部及兰学、国学的严峻挑战而趋于弱化，疑华、蔑华思潮增长，传统中国观的“裂变”业已开始。尽管如此，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满清王朝的那张“窗户纸”被捅破之前，中国之于日本依然是个庞然大物，是可敬而可畏的存在。

但是，中国在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失败并被迫与英国等列强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开埠，从此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56年至1860年，英法寻衅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再次战败并丧失了更多领土和主权，殖民地危机进一步加深。

鸦片战争使相对平静和封闭的东亚社会进入了云谲波诡的剧变期，其“数千年一大变局”所导致的一个结果是，日本古来效仿的楷模已经坍塌，其中国观开始急剧地反向逆转。

一、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殷鉴”论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时，日本同样面临着如何应对西力东渐的问题。因此，英国迫使貌似强大的清政府屈服，对日本朝野产生的影响是震撼性的。“周公孔子之国”何以战败？如何应对才能避免覆辙？成了日本认真思考和亟待回答的课题。

日本朝野的鸦片战争观

两次鸦片战争后，日本各界对战争的原因、是非曲直、结果及影响进行了报道和分析。

古贺侗庵（1788—1847）在1841年完成的《鸦片酿变记》中，认为鸦片战争的性质是“清直而英机黎曲”。指出“太西诸夷多沾鸦片于支那以殖利，而于己国则惟不许吃烟草，严禁服阿片”。“戎虏豺狼之性，饕餮之欲，唯利是竞，不顾信与义”。“非理无道，实在英机黎而不在清”。^①在分析了清朝所以惨败的病根时，古贺指出：海防对策上“盖其国之濒海，不修船舰火器，

^① [日]前田勉：《近世日本の儒学与兵学》，ペリカン社1996年版，第427—428页。

日本近代蔑视型中国观的形成

实为防御之大阙典”；思想意识上“清之海防不知是否有过于我者，而彼之凶矜乃尔。盖妄自夸扬己邦，实支那之病根也。”^①其后，古贺又在其他著述对中国的失败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腐儒的通病在夜郎自大而不通外国事情”，“支那人惟其夸诩自大，故见闻日狭。见闻日狭，故夸诩自大甚滋，理势之必至也。”而“不能采万国之所长而施之政，其治必不能跻于郅隆”。^②由此他感叹道：“满清地大于欧罗巴全洲，富强莫与为比。但其侈然自大，不务外攘，迺者曰鸦片之禁，与英夷构怨，大为所摧破。纳金乞和才自免。此覆车之灼灼可鉴者也。”^③

斋藤竹堂（1815—1852）1843年写就《鸦片始末》，对鸦片战争始末进行了系统论述，并在结语处清楚地表达了三层见解。第一，鸦片战争前，清朝“疆之大、力之强，自有汉土以来，未之闻也”，是“堂堂仁义之大邦”。这里折射了战前日本具有普遍性的传统“中国印象。”第二，“鸦片之事，曲在英，直在清”。英国“不知礼义廉耻之甚也。吾自海外闻之，犹不能无唾弃骂斥之心”。表明了对战争起因及性质的清醒认识和正确立场。第三，英胜清败的原因“在平日不在鸦片之事也。”清朝的弊端在于“汉土常以中夏自居，侮视海外诸国如犬彘猫鼠、冥顽不灵之物，不知其机智之敏、器械之精，或有出于中夏之所未尝识，而汉防之术茫乎不讲”；英国的强悍则不仅在于“航海纵横，称雄西域”，而且对中国“窥视累岁，颇有得清国要领”。从而以是否知晓世界、是否有“机智之敏”和“器械之精”、是否颇得对手的“要领”，言简意赅地点明了双方胜负的内在原因。

盐谷宕阴（1809—1867）1847年编撰《阿芙蓉汇闻》，1857年结集《隔靴论》。

他认为清朝对外不知洋夷“坚舰如山”，对内不知“汉奸如蝇”，而洋夷对清朝风土人情“乃至文字言语，政治得失，官吏能否，戎备虚实，莫不洞悉。”故而“洋夷知彼知己，清人以华自高而不务索外蕃之情，及至交锋，则

① [日]前田勉：《近世日本の儒学与兵学》，ベリカン社1996年版，第430页。

② 转引自[日]真壁仁：《德川后期的学問与政治》，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7年版，第224、253—254页。

③ [日]古贺侗庵：《輿地图志序》（1845年2月），见[日]箕作省吾：《坤輿图识》，梦霞楼藏版，1845年。

如以铎称鎰。”^①盐谷还认为，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之距清土才一苇，而夷之涎垂于东海。”“自我观之，西海之烟氛，又庸知不其为东海之霜。”因此，他疾呼：“鉴乎邻而警乎我，及暇修备，使豕蛇鲸鲵震誓逃避不暇，则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②

高岛秋帆（1798—1866）在《天保上书》中分析了中国失败的原因，指出英国“与唐国相比，土地颇为偏小，更与其争战极为不利。然却如斯大胆袭来，以至唐国大败，英方无一死亡，其趣全在平生所持之武备”。反过来，他“嘲笑唐国之炮术如同儿戏”。^③

横井小楠（1809—1869）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政教风俗不如人，认为中国“乃亚细亚洲中一大邦，古往大圣相继勃兴，文物领先于万国，故将未开化之草昧外国分为九夷八蛮，施以怀柔之政。以降，主愚暗而失贤明，世代革命多，却自称中国华域，待外国为蛮夷与古无异。”然而“道光末年，鸦片之乱始为英国挫败，不得不立和亲之约。……彼屈大义而怖兵威，折良港沃土以偿违约之罪，极其屈辱，然朝廷仍优柔寡断，无惩戒反省之念。”^④

萨摩藩藩主岛津齐彬（1809—1858）对清朝的堕落甚为惊讶，认为英、法攻陷北京，清帝远逃，而后缔结城下之盟，“实乃甚不知耻也。”慨叹中国“已病入膏肓，难以疗治，殊至割地、乞和，则无药可救。”^⑤

吉田松阴（1830—1859）是幕末忧国忧民的“志士”、尊王攘夷运动的教父，其得意门生中包括久坂玄瑞、高杉晋作、吉田稔磨、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倒幕维新运动领导人。与前述的鸦片战争观不同，吉田关心的不是战争

① 《阿芙蓉汇闻序》（1847年正月），收入《宕阴存稿》卷四（刻于1867年11月，成于1870年5月）。

② 《宕阴存稿》卷十二。

③ [日]高岛秋帆：《天保上书》，载[日]杉浦明平、别所兴一编：《江戸期の开明思想》，社会评论社1990年版，第172—173页。

④ [日]横井小楠：《国是三论》，载[日]松浦玲编：《日本的名著30 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中央公论社1987年版，第319—320页。

⑤ [日]岛津齐彬：《齐彬公史料》，载[日]杉浦明平、别所兴一编：《江戸期の开明思想》，社会评论社1990年版，第193页。

日本近代蔑视型中国观的形成

的是非曲直，而是清朝何以失败的“殷鉴”，以及日本如何面对世界和中国的问题。它认为清朝的失败“不在外夷而在内民”，且“不知彼亦太甚”。^①在日本如何应对西洋与邻国的“方策”上，他反对一味“自保”，而是主张以攻代守，即“善保国者，不徒毋失其所有，且应增其之所缺。今急修武备，舰略具、炮略足，则宜开垦虾夷，封建诸侯。乘隙夺取堪察加、鄂霍次克，谕琉球朝觐会同如内地诸侯，责朝鲜纳质奉贡如古盛时。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渐示进取之势。”^②其后又说，战略上“与俄、美讲和既定，决不可由我背约而失信于戎狄。然恪守章程，厚信义，其间蓄养国力，割占易取之朝鲜、满洲、支那，于交易中失之于俄国者偿之以鲜满土地。”^③

由此可见，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在日本的形象已经一落千丈。通过战争原因和性质论、中国殷鉴论、世界战略及对华政策论的探讨，日本的传统中国认识开始逆转。

“千岁丸”上海行的实地感受

1853年美国佩里舰队的“黑船来航”，惊醒了日本长达二百余年的“太平梦”。之后签订的“安政条约”，则意味着鸦片战争后中国出现的殖民地危机已经在日本降临，中国的现实或许就是日本的未来。

1862—1867年，在以中国为鉴的呼声中，幕府4次组团实地考察中国，其中于1862年6月3日至7月1日第一次派遣的“千岁丸”上海之行意义重大。

“千岁丸”上海行的目的，一是了解中国政情民风，探讨两国邦交（“通信”）的可能性；二是考察经贸状况，探讨中日通商的可能性；三是考察租借地的实态和关税制度等，为日本处理居留地贸易的有关事务提供参考。其具体考察内容包括：上海及其周边地势，城市生活，社会状况，军事部署，租借地贸易等，为此大量接触了地方官府和社会名流。

根据纳富介次郎的《上海杂记》、日比野辉宽的《赘路》和《没鼻笔语》、名仓予何人的《官船千岁丸海外日录》、松田屋半吉的《唐国渡海日记》、峰

① [日]吉田松阴：《吉田松阴全集》第2卷，岩波书店1934年版，第23—24页。

② [日]吉田松阴：《幽囚录》，载《日本的名著31吉田松阴》，中央公论社1989年版，第227页。

③ [日]吉田常吉、藤田省三编：《日本思想大系54吉田松阴》，岩波书店1978年版，第193页。

洁的《船中日记》和《清国上海见闻录》、高杉晋作的《游清五录》等考察记录和感想文，考察团的想法是：上海表面上“比之美利坚之华盛顿、纽约，其繁华犹远胜之，”^①实际上财富为洋人所持，百姓的贫穷自不待言，官府也捉襟见肘。“到上海兵营见其兵卒，士兵敝衣、垢面、徒跣、露头、无刀。皆如乞食，未见一人有勇者。如此我一人可敌其五人。若率一万骑兵而征之，可纵横清国。”^②“清国本是文学无双之国，却无以治国之论。”“清国危如累卵，实在可怜。”^③“清国之病不止在腹心，而且现于面目、溢于四体，一指一肤莫不所痛。如此，以上海一处而推十八省，可知其大概。”^④

在千岁丸上海行的各种见闻录中，高杉晋作所写的《游清五录》观察深入，颇具影响，其主要见解是：上海“繁盛”，但富在洋人、贫在中国，“上海为支那南边之海隅僻地，尝为英夷所夺，津港繁盛皆因外国商船多之故。城内外多为外国人商馆，故繁盛。见支那人居所，多为贫者，其不洁之事难以言表。或终年居于船中，唯富者役于外国人商馆。”^⑤洋人和中国人地位不平等，“支那人尽为外国人役使，英法人步行街市，清人皆避傍让道。上海之地虽属支那，谓英佛属地，又可也。”^⑥中国军备松弛，“看其兵法，似威南塘兵法而非者。銃队以金鼓为令，为操引操进，其余无变化。銃炮尽中国制而甚不精巧，兵法与器械皆无西洋，唯阵屋用西洋。”^⑦那么，中国何以如此呢？高杉的结论性看法是“君臣不得其道”。^⑧

“千岁丸”的上海之行，是日本隔断与中国200余年人员交往后的一次准官方代表团的实地考察。对日本人说来，此次直面中国的印象是冲击性的，传统的仰慕型“文化中国”的“想象”为现实所粉碎，中国已成为与日本大

① [日]名仓予何人：《海外日记》（1862年5月初六日），见冯天瑜《“千岁丸”上海行》附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7页。

② [日]纳富介次郎：《上海杂记》，冯著附录，第318页。

③ [日]纳富介次郎：《上海杂记》，冯著附录，第311页。

④ [日]日比野辉宽：《赘脱录》，冯著附录，第346页。

⑤ [日]田中彰校注：《日本思想大系1（开国）》，岩波书店，第244页。

⑥ [日]田中彰校注：《日本思想大系1（开国）》，岩波书店，第273—274页，冯著附录，第447—448页。

⑦ [日]田中彰校注：《日本思想大系1（开国）》，岩波书店，第226—227页。

⑧ [日]田中彰校注：《日本思想大系1（开国）》，岩波书店，第2278页，冯著附录，第455页。

同小异、某些方面甚至还不如日本的老朽贫弱国家。

二、中国对策论的主张和较量

两次鸦片战争后，日本人心中传统的中国形象及其仰慕中华的意识已经消失殆尽。接下来问题是，在中国的“殷鉴”下，日本应如何应对西力东渐，避免重蹈中国的覆辙，同时还必须确定对中国的态度和对策，即是亲近还是疏远？是合作还是对抗？事实上，直到甲午战争爆发，日本思想界围绕对华政策选择的争论始终没有止息，但其总体趋势变动的基本特征是：对华态度渐次由平视向轻视、敌视、蔑视转变，行动主张由合作向别离、挑战转变，进而与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构成了相互刺激和影响的互动关系。

中日“连横论”

中日连横论是幕末至明治初期日本社会颇具影响的战略主张，中日唇齿关系论、对华亲善论等亦可归属同一范畴。值得注意的是，连横论者往往又被视为“早期亚洲主义”者。

鸦片战争后盛行一时的中日连横论可以通过当时有关人物的思想主张、有关团体的活动、新闻导向及“热点”窥之一斑。

首先是个案人物的思想主张。

会泽安（1781—1863）作为早期亚洲主义萌芽期的代表人物，曾在1825年发表的《新论》中提出“中日唇齿”的主张，认为“若夫未尝沾染回回逻马之法（指伊斯兰教与基督教）者，则神州（指日本）之外，独有满清。是与神州相为唇齿者，清也。”^①显然，他是从地理、文化相近产生利益连带关系的角度，阐述中日合作对抗西方的必要性的。

佐藤信渊（1767—1850）对满清统治下的中国情感极其复杂，敬慕、蔑视、怜惜、利用等思虑混杂，但是从大处着想，还是希望中国有所振作，成

^① [日]会泽正志斋：《新论》，载瀬谷义彦、今井三郎、尾藤正英编：《日本思想大系53（水戸学）》，岩波书店1973年版，第398页。

为日本的“西屏”。在1849年写成《存华挫夷论》中，佐藤对亚洲人和欧洲人的本性作了区分，认为“亚细亚洲人崇礼行义，各自确然守其境界，侵伐他国、夺取他物之念寡，故远涉海外以利欲为业者稀。欧罗巴人好利恣欲，欺夺之念深而贪得无厌。”“欧罗巴人之心全同豺狼，不可不严备”^①。因此，“愚老欲盼满清君臣处心积虑，赈贫吊死，上下同甘共苦练兵数年，乃起复仇之义兵，征伐英夷而大破之，收复失地，完全攘除于东洋，若此，满清可永为本邦之西屏。”^②

横井小楠听到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天津、进逼北京的消息时忧心如焚，认为“支那与日本为唇齿之国。唇亡齿寒，其覆辙就在眼前。非坐视旁观之秋。”^③

平野国臣在1863年的《制蛮础策》中主张，中日“两国相与合力，一其志，断然扫夷不予之以寸尺之地，逐诸洋外。”^④

德川幕府高级海军将领胜海舟在1863年的日记中写道：“当今亚细亚几无人有意抵抗欧罗巴。此乃胸臆狭小而无远策之故。以我所见，当以我国出动船舰，前往亚细亚各国，向其统治者广为游说”。其后，胜海舟又在《解难录》中建议，中、日、朝三国应结盟“合纵连横共抗西洋。”^⑤

进入明治初年，右大臣岩仓具视也认为：“清国占据亚细亚洲之大部，土地辽阔，人口众多，无与伦比，与我国为唇齿之邦，近来虽政纪废弛委靡不振，但因与我国关系颇大，故应厚和谊以建久远之基。”^⑥

中日唇齿论或连横论，主张相似，但论者的主观动机未必相同，这一点留待后述。相比之下，中村敬宇提倡的中日亲善论洋溢着正直的善意，尤显难能可贵。

中村敬宇（1832—1891）是明治时代与福泽谕吉比肩而立、思想倾向

① [日]本诚一编：《佐藤信渊家学全集》下卷，岩波书店1927年版，第863页。

② [日]鴉田惠吉编：《佐藤信渊选集》，读卖新报社1943年版，第355—356页。

③ [日]横井小楠：《国是三论》（1860年），载《日本思想大系55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桥本左内》，岩波书店1971年版，第449—450页。

④ [日]井上哲次郎、上田万年监：《勤王志士遗文集》2，大日本文库1941年版，第125页。

⑤ [日]松浦玲《明治的海舟与亚洲》，岩波书店1987年版，第102—103页。

⑥ [日]岩仓公旧跡保存会：《岩仓公实记》下卷，岩仓公旧跡保存会1947年版，第235页。

日本近代蔑视型中国观的形成

却迥然相异的“思想界一伟人”。这位从幕府时代走来的“儒者”具有温厚的君子人格，能够在弱肉强食的西风下傲然挺立，克服功利主义的激进与狂躁，守护着正义与和平的底线。1860年，中村看到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并迫使咸丰帝出走的报道时，“慨然兴叹，不觉涕泗之潜然下也”。他抨击“膺夷横行，污蠹天地”的洋夷“盗国”为不义之举，企盼中国“大惩创之后，必有大愤悱焉。今清虽丧都城，尚全满州以守之。果能尝胆卧薪，以图恢复，乌知不有变衰为盛、转祸为福者乎？秦陇川广之间，又乌知不有举义兵以应之者乎？”^①1874年，日本出兵侵略台湾，朝野敌视、轻侮中国情绪蔓延。然而中村敬宇不入浊流，在1875年4月号的《明六杂志》上发表《支那不可侮论》一文，告诫国人“支那为吾师匠之国，可畏而不可侮”。^②1876年腊月，又在《栈云峡雨日记序》中正面论述了应与中国“亲厚”的道理，即“我东方亚细亚洲，文艺最盛、人物多出，莫禹域若也。疆域广、生齿繁，莫禹域若也。可与欧罗巴颀颀者，莫禹域若也。禹域与我邦，文字同，可亲厚一也。人种同，可亲厚二也。辅车相依，唇齿之国，可亲厚三也。亚细亚不及今同心合力，则一旦有事，权归于白皙种，而我黄种危矣，可亲厚四也。”“今也，我邦与禹域，务当小大相忘、强弱莫角、诚心实意、交如兄弟、互相亲信、不容谗间。有过相宽恕，无礼不相咎，盖二国所期者，在于同心协力，保护独立，以存亚细亚之权而已矣。”^③

其次是亚洲主义团体的活动。

进入1880年代，随着中国对策讨论范围的扩大，一些亚洲主义团体成立并积极展开活动，而“亚洲主义者”所关心的核心对象仍不外是中国，由此中国论开始与亚洲论捆绑进行。

1878年，在曾根俊虎等人的筹划下，“近代日本第一个亚洲主义民间团体”^④振亚社成立。

① 《敬宇文集》卷十三，吉川弘文馆1903年版。

② [日]大久保利谦编：《明治文学全集3（明治启蒙思想集）》，筑摩书房1967年版，第302—303页。

③ [日]小岛晋治监修：《幕末明治中国見聞録集成》第19卷，ゆまに书房1997年版，第189—193页。

④ 王屏语。见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56、61页。